

第一编



绪 论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成的最初阶段是在先秦时期，这是从远古经夏、商、周三代直至秦统一（前 221）之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文学的发生总要在人类具有能交流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之后。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和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各种情感、要求以及美好的愿望总要表达出来，发言为声就产生了最初的文学——上古歌谣。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究竟在何时，迄今为止仍无确切证明。神话表达了人类欲支配自然，改造社会的愿望和企盼，是我国最早的叙事作品。歌谣和神话经过口耳相传并加进了传者的想象和改编，虽非原貌，但也反映了文学最基本的特点即抒发感情和表达愿望。远古歌谣由于流传下来形诸文字的较少，因此一些传世的据说尧舜时的作品显系后人伪托。我国神话资源分布在远古岩画和出土文物以及《诗经》、《山海经》、《穆天子传》、《庄子》、《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中。我国最早的诗歌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这个传点对后代诗歌的形成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东北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四川金沙遗址、湖南永州舜帝文化遗址中的发现，证明仅中国稻作农业文化的历史就可推到 8000 年以前，从而打歌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成说。

据 1996—2000 年的“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结果断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 2070 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 1600 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 1046 年。”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是夏代文化的遗址。据说夏禹传位于启，“公天下”成为“家天下”。国家组织逐渐形成。公元前 1600 年商汤灭夏建立了商朝，第 20 位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附近），史称殷商。商代农业、畜牧业、商业都得到发展，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城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商后礼。”（《礼记·表记》）商代祭祀文化盛行，主祀者为巫。尊神祭祀的祝颂即表达了人们对祖先神灵的敬畏以及祈求和愿望，也形成了融合歌舞、音乐、绘画、表演、原始宗教为一体的文化形式。

中国文字究竟产生于何时尚难确定，据今所见数量较大，最古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甲骨文是占卜所用，文辞虽少，可见卜者的愿望和捉摸不定的心理。上古巫史不分，甲骨文卜筮结果的记录，以及铜器铭文的事件记录，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和历史意识。

公元前 1046 年周朝建立，定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周统治者鉴于殷商的教训，实行分封制，并确立以“礼”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典章制度，以此作为统治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西周至夷王、厉王时期，统治日趋腐数，国力日衰，传至幽王，愈加暴戾，内忧外患，幽王终于在公元前 771 年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前 770），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前 476—前 221）两个时期。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王室愈表。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合纵连横，二百年争战，最后由秦统一。

西周至春秋，一方面巫文化向史文化过渡，另一方面则是礼乐文化由盛而衰的过程。《尚书》是上古历史文献的记录，其中体现出浓重的历史意识。2003 年 1 月 19 日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的西周宣王时期单氏家族的青铜器铭文，记述从周文王到周宣王十二代王的名号，均有天干地支记录，证明了巫官文化向史官文化的过

渡。孔子不满于周道衰废、礼崩乐坏，遂编《春秋》，其地位、身份和私家著史的境况，使之采用了寓褒贬于记事中的“春秋笔法”。《左传》则无所顾忌、据实而录、详于记事，使我国历史著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左传》的记事为主，兼记言行，《国语》的偏重记言，到《战国策》铺排策士言行，可见历史散文由重记事到重写人的发展轨迹。《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形象的散科书。《国风》中的一些诗歌多抒发了个人的真实情感，《雅》、《颂》之作多表达了人们对歌治的关注和祈祷愿望。比兴的运用，使人们找到了物我之间的联系和借物言志（情与理）的表达方式。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虽然异说林立，风格迥然，促实分两派：以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为一派，其主张在于以仁、爱、礼、法去调和解决人际社会的矛盾，实行自己的政治化理理想；以老、庄为一派，考虑更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的生存状况以及人的适性而为等问题。注重人际关系，必然要以犀利的言辞、严密的论证去阐述己意、说服别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开辞想象的天空，则天马行空，展现的是自己思想的博大和深诸，遨游在自己的精神境界中。战国末期诞生的伟大诗人屈原，将文学的自觉和自为据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作品得益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和荆楚地域文化的滋养，以及对苦难深重的国土人民执著的眷恋和挚爱。

先秦文学发展线索仍是模糊朦胧的，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繁决。可喜的是新世纪伊始，考古学界就为我们献上了一份份厚礼，上海博物馆楚竹简，湖北九连墩楚简，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等，为我们展示了大量的历史文歌。随著考古的不断发现，新世纪将会为先秦文学的研究带来灿烂的曙光。

第一章 上古文学

第一节 上古歌谣

我国最早的文学是上古歌谣。它是与音乐、舞蹈艺术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它是在人们的生产劳动过程和人际交往情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古人劳动时为了协调劳动节奏,减轻疲劳,表达美好的愿望和收获的喜悦而创作了歌谣。《淮南子·道应训》:“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几句话虽是指当时作歌而言,而以此推断上古人创作歌谣的情形,也应如是。鲁迅也认为:“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的话,举具体的事例推测了劳动生产与原始歌谣的创作有着直接的联系。上古人类除了劳动之外,还有人际交往等社会活动,在这些交往中难免有感情的交流和表达。人们的喜怒哀乐愁以及爱和恨都需要用语言声音表达出

来,就会产生歌谣。上古歌谣绝大多数都因没有记载和流传下来而湮没无闻。《宋书·谣灵运传论》云:“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稟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也推断出文献所无载的歌谣,理应伴随着先民的生产劳动和情感交往而相生相长。

《弹歌》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歌谣,只有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这是狩猎过程的描述和再现。它有明显的劳动目的和生活歌望。歌中两字一句的短促节奏与弹射迫促的音响相协调,八字组成四个动宾结构,就极具概括力地展现了制造和使用弹弓狩猎的过程,语言质朴有力,表现了一种豪迈的气概。“飞”、“逐”尤为生动。梁代刘勰云:“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文心雕龙》)指出了这首歌的古老。

早期的歌谣是与音乐、舞蹈融合在一起的。《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上古一个叫做“葛天氏”的部落歌舞祭祀的活动: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1]

三人手持牛尾一边投足一边歌唱。这些歌词虽已不存,但从其歌唱的八阙题目来看,内容当是对天、地、祖先、神灵的颂赞,祈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草木繁茂,与农业、畜牧业生产劳动密切关联。

第二节 上古神话

神话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初始阶段的产物。马克思认为神话是“谣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类发展成为能通过语言交流表达思想的人以后,自身的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仍处于低级阶

段,对于威力强大的自然力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某些发明创造等不能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只能以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把自然物、自然力和社会力加以神化和人格化,幻想出一些超自然的神和神的故事,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产生了神话。神话也表达了人类欲支配自然力,改造社会的愿望和企盼,宣泄了人们的情感和情绪,成为最早的叙事作品。

神话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大地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也蕴藏着丰厚的神话资源。中华文化中的神话资源大致分布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 远古的岩画壁画。中华大地从南到北,许多地方分布着刻绘在山岩壁上的岩画群,如内蒙阴山岩画,宁夏贺兰山东麓山口岩画,新疆呼图壁岩画,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云南沧源崖画,青海冈察岩画,甘肃嘉峪关黑山岩画等,反映了石器时代人们的狩猎、游牧生活和信仰,通过描绘日月星辰、动物植物、男女交媾等,体现出人们的天体崇拜、动植物崇拜、生殖崇拜等创世始祖观念及人文之初对自然万物、人类本身的探究和思考,这些岩画包含着一些神话的因子。^[2]

(二) 出土文物的神话形象。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 2.6 米大立人铜像或许是沟通天神、地祇和宗祧的巫师;高达 3.96 米的青铜通天大神树,上面一条浑身带着刀剑的神龙从树顶蜿蜒而下,树上 9 只神鸟,21 朵奇花异果,具有神秘的数字含义;青铜纵目人仿佛是众神之宰^[3]。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出土了女神头像^[4]。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龙凤人物帛画》,表现了龙凤引道升天的寓意。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御龙图》乘龙升天形象,缙书四周画像中有青、赤、白、黑怪异树本以及三头、双角、衔蛇、鸟身等形象。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的五幅帛画和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出土的帛画都将神话与现实结合起来,描绘天上、人间、地下的情景。^[5]这些出土文物将神话形象化了,随着考古新发现将会有更多的神话资源被发掘出来。

(三) 少数民族流传着的神话故事。关于日月神话就有苗族的金银铸日月神话,壮族的侯野射太阳,瑶族的射太阳,彝族的吉智高卢射日月,布朗族的顾米亚射日月等。创世神话有纳西族的人祖利恩,壮族的布洛陀与妹六甲等。由于地区民族之间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差异,存在着生产力和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引入借鉴较为先进民族文化的情况,神话也不例外,少数民族的射日神话就明显受到汉民族后羿射日神话的影响。

(四) 文献记载。这是研究中国神话的文字资料。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来,神话较多地保留在《诗经》、《山海经》、《穆天子传》、《庄子》、《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中。《诗经》、《楚辞》、《庄子》本书将有专门论述,这里对其他的几部典籍略作介绍:

《山海经》,今本十八卷,约三万余字。一般认为约成书于战国间,其中有些部分为秦汉人写定。全书分为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记事以山海地理为纲,述及历史、神话、宗教、民族、物产、医药、巫术等许多方面。保存着鲧禹治水、精卫填海、黄帝战蚩尤、夸父逐日、后羿善射、刑天舞干戚等神话以及各种异国怪物的描写,想象丰富而奇特。

《穆天子传》,又名《周穆王游行记》、《周王传》。书成于何时不确定,但至晚在战国魏襄王(前 318—前 295 在位)时已写定。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得一批先秦古书(即《汲冢书》),此为其一。晋荀勗等校理为五卷,郭璞作注,增《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编为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北征戎族,西游瑶池会西王母,来归洛阳会诸侯事。其中见西王母一节,以及昆仑黄帝之宫、河伯、长肱等事,颇典神话色彩。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集门客三千编撰。“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列传》)。二十六卷,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杂取儒、道、墨、名、法、农、阴阳等各家学说,被称作杂家著作,保存了许多先秦百家学说及古代史料,其中有关颛顼、帝喾、禹

等神话传说也丰富了中国神话宝库。

《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主编。本有内篇、外书、中篇，今存内篇二十一卷，各篇名后“训”字，为注家所题，其书以阴阳五行和道家思想为主，杂糅各家学说，故列为杂家著作。其中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嫦娥奔月、共工触山、夏禹治水等著名神话都藉此书而流传。

中国古代的神话按其内容大约可分两大类：

一 事物起源神话

远古人类在认识的初始阶段也凭自身的经历、幼稚的思维和求知勇气去探究和描述世界最根本的问题，即万物起源问题，包括天地开辟的创世神话，日月星辰形成，人类降生，动植物起源等。

1. 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

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了战国楚帛书，“中间八行一段文章，讲的是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时代最早的创世神话文献。”^[6]帛书所载伏羲生四子，即春、夏、秋、冬四时之神，四神从一团混沌中开天辟地，使日月分明和四时运行，而日神与火神祝融奉天之意及炎帝之命统率四神，进一步完成创世工程，使天家由混乱到有序，这是南方楚文化所传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伏羲是开天辟地的始祖。

除此之外《淮南子》中有二神混生、经营天地之说：

古未有天地之时，唯象无形，窈窕冥冥，……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淮南子·精神训》）

《淮南子·天文训》中还有所谓浑沌为太始，“太始生虚霁，虚霁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之说。《淮南子》所说带有道家主张宇宙万物由气生成的哲

学思考。有别于外国神话所描述的卵生型和尸体化生型创世形态。可以说，战国楚帛书和《淮南子》所载是中国本土的创世神话。至于为人常论及的盘古开天辟地神话，其本源是伴随佛教而传来的印度神话，^[7]它的创世形态分为卵生型和尸体化生型，但传入中国后被改造，与气生型神话相融合：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纪》）

这是三国时吴人徐整记录的流行于南方的神话。徐整在另一篇《五运历年纪》中还记录了盘古死后化身的神话：

元气濛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玉，精髓为珠石，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绎史》卷一引徐整《五运历年纪》）

从这些创世神话中，可见中国先民已经在积极探索自然之物的本源问题，并将它与人类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思索。

2. 始祖神话

人类不仅对万物起源感兴趣，而且对于自身是如何产生的也努力探究。原始社会探索人类起源与祈求子孙繁衍、人丁兴旺的观念相一致。新疆呼图壁岩画中心就是一高于真人的双头同体人像，其左右上下皆为探体男子像及男女交媾图，表现出人们传有一种始祖观念和生楚崇拜思想。徐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记载着伏羲与其妹女娲结成夫妻而繁衍了人类的传说，大量少数民族传

说以及考古发现的汉画像砖画也证实了这一点。^[8]汉画像砖上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或异体交尾，或同体异首，是人类的始祖。此外还有女娲抟黄土造人之说：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

这是母系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状况遗留下的观念，是对女性生育作用的肯定，至于说贫富贵贱的产生是女娲造人时精心制作与粗制滥造的结果，则是后代阶级社会中命中注定天生贵贱观念的附会之说。

3. 发明创造神话

人们在千万年生产劳动实践中发明创造了许多器物和制作方法、知识技能等，而神话却把这些智慧和经验归结于本部落、本民族、本行业的神话英雄人物。这一方面反映出神话向人性化发展的特点，一方面又反映了社会分工和社会阶层日益明细化的趋势。

伏羲和女娲既是创世造人的始祖又是发明造物的始祖。他们手持规矩，观象制器，有许多发明创造。

农业。1997年在陕西神木县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有伏羲、女娲人面鸟身手持日轮月轮和规矩的“春神句芒”和“秋神蓐收”的画像，主管春播秋收的季节。

渔猎。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易传·系辞下》），“教民以猎”（《尸子·君治》）。

庖厨。“包羲氏取牺牲供庖厨，以炮以烙。”（《帝王世纪》）

八卦和数学。“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系辞下》）“伏羲作九九之数。”（《管子》）

医药。“伏羲尝味百药而制针灸，明百病之理。”（《太平御览》卷七二一引《帝王世纪》）

音乐。“伏羲氏作瑟，造《驾辩》之曲。”（《楚辞·大招》王逸注）“女娲作笙簧。”（《世本·作篇》）

婚姻。“伏羲制嫁娶，以偕皮为礼。”（《路史·后纪》注引《古史考》）

其他发明创造也归结于不同的神话人物。如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氏是农业和医药的始祖，有巢氏是巢居的发明者，后稷是农业之神，仓颉是文字的创造者，后羿是弓箭的发明者，嫫祖是蚕桑的始祖等。

二 反映人类与自然斗争以及人类之间战争的神话

人类自从诞生以后，除了想要了解自然万物和人类自身的由来以外，人们的认识还必须面对最为现实的问题，即如何生存的问题。人们的生存环境即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应对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各种恶劣环境的挑战，人类就是在适应和战胜各种恶劣复杂的环境中发展壮大繁衍成长起来的。人类将祖先千百万年同各种环境斗争取得的胜利，以及在斗争中反映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都归结于某个神话英雄人物，创造出了许多神话。

1. 地震、火山、洪水、旱灾神话

女娲补天神话。女娲是人类创造之神，她还是拯救人类之神，面对自然灾害，始为人类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天地：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燃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淮南子·览冥训》）

这可能是一次特大地震或火山爆发后引发特大洪水的记录，天崩

地陷，洪水浩洋，人类虽然遭遇了灭顶之灾，付出昂贵的生命代价，但仍凭顽强的斗争意志，生存了下来，人们把它归功于人类之母女娲。

鲧禹治水神话。人们在与自然斗争中，从来有战胜地震、火山等灾害的记录，但是在与旱涝斗争中，人们一次次总结经胜和教训，逐渐取得了主动权，有史以来历代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证明了这一点，而治水的始作俑者人们归结于鲧、禹父子：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

这则神话歌颂了鲧牺牲自己以治洪水的不屈精神，他为了治水拯救人类，不惜盗天帝的息壤，他死后仍不忘治水，以腹生禹，子承父志，前仆后继。天帝对鲧的惩罚实即自然对鲧“堙”的方法的惩罚。据说禹治洪水采用“堙”、“疏”并举的方法，治服了洪水。^[9] 鲧禹治水过程反映了人们在同自然的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方法的历程。

精卫填海的故事写炎帝少女“女娃游于来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也是遭受水害不屈抗争的故事。

夸父逐日和后羿射日的神话也可看作是人类同干旱斗争的故事。^[10]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

夸父与干旱斗争，干渴而死，但其杖其身化为邓林（即桃林），“夸父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列子·汤问》）邓林广袤，其精神永存。

2. 战争神话

远古的人类在与各种自然环境的斗争中，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与自然相处相生，顽强地生存繁衍壮大起来。但人类的发展接着又面临着生存空间的狭小、自然资源的匮乏等问题，因此为了争夺更大更好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各氏族部落间常发生争斗，后发展为大规模的部落间的战争，人们把带领自己部落取得战争胜利的祖先加以神化，形成了一些战争神话故事。

中国战争神话主要是关于黄帝部落与其他部族的战争。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黄带姬姓部族与炎带姜姓部族在向东发展迁徙过程中发生了战争，“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貔、虎为前驱，鹳、鹄、鹰、鸇为族帜。”（《列子·黄帝》）“黄帝与赤帝（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行其志。”（《大戴礼·五帝德》）黄帝驱赶猛兽上阵助攻，以猛兽为其族帜，经过多次艰苦的战斗打败了炎帝，实现炎黄两大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黄帝战败炎帝后，炎帝之裔和部属蚩尤、夸父、刑天、共工等为炎帝复仇，又与黄帝及其后黄大战，蚩尤与黄帝作战呼风唤雨，十分戴烈：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

炎帝之裔共工与黄带后裔颛顼争帝头触天柱不周山：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天文训》）

这几次战争进一步徙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战争神话故事中，威力强大的自然力仍然为人性化的神所驱接，神

话进一步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和表现力,设置宏大的场景,制造激烈的气氛,突出了人类不屈的精神。特别是共工与颛项争帝故事,将自然现象如日月西坠、江河东流的解释与人们战争的结果结合在一起,突出共工“怒”之精神的巨大威力,想象奇特,深得神话的精髓。

中国古代神话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古代神话为后代作家、诗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学素材和艺术形象。《诗经》中“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长发》)对禹的歌颂,记述商族始祖契和周族始祖后稷的诞生灵异,屈原《离骚》、《天问》中记述的女媧、羿、鲧、禹等都是直接取材于神话的素材和形象。后代作家诗人在广泛吸取继承神话素材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学形象和作品。《庄子》借助于鲲鹏、藐姑射神人、悠、忽、混沌等神话形象为其构筑超然物我、逍遥翱翔的精神世界服务。《西游记》在漫长的演化成书过程中大量吸取了《山海经》、《淮南子》等文献中的神话素材,融合加工改造成孙悟空、猪八戒等新的形象以及系统化的神魔故事。二、古代神话故事中的女媧、鲧、禹、夸父、精卫、刑天等形象表现的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对光明理想的追求和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所形成的精神力量为后代文学所继承和发扬。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九死而不悔”,上下求索,四方求女,坚持固揽,对理想的追求,无疑从神话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支撑。陶渊明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自抒怀抱,讴歌自强不息、至死不屈的精神。从《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中可看到他与共工、刑天的叛逆精神一脉相承。三、古代神话中浪漫奔放的幻想也启发了后代作家的思维,拓展了他们想象力和表现力的空间,使他们在创作中突破了时空、物我、生死、人神的界限,过去未来任意驱遣,咫尺天涯凭我往来,千变万化随心所歌。我们可从庄子、屈原、李白的作品中看到纵横驰骋的超凡想象,光怪陆离的神奇夸张。至于笔涉神怪,心驰幻域的《西游记》更是“以锦绣之心,风雷之笔,涵天地于掌中,舒造化于指下,无者造之而使有,有者化之而使无。”(清黄

越《第九才子书评鬼传序》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伏虎擒龙、降妖捉怪，神通广大；定风珠、芭蕉扇、风火轮、照妖镜、千里眼、顺风耳，无奇不有，将想象的天幕张大到极限。

注 释

[1] 清毕沅校注云：“旧本‘建帝功’作‘达帝功’。案：《文选·上林赋注》张揖引作‘彻帝功’。李善谓以‘建’为‘彻’误，则当作‘建’也。又旧本作‘总万物之极’。校云：一作‘禽兽之极’。今案《初学记》十五、《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及《选注》皆作‘总禽兽之极’，今据改正。”《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643页。

[2] 参见《中国岩画》，文物出版社1993年5月版，盖山林著《中国岩画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版。

[3] 参见冯学敏、梅子著《点击三星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42—59页。

[4] 参见《文物》1987年第8期《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一文。

[5] 参见王伯敏著《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3页。

[6] 见杨宽《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本文观点材料取自杨文。

[7] 叶舒宪云：日本神话学家高木敏雄和中国史学家吕思勉曾指出这一点。见叶舒宪《从“盘古之谜”到中国原始创世神话之谜》，载《民间文艺季刊》1989年第2期第7页。

[8] 见闻一多《伏羲考》，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第683—75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版。

[9] 详见袁珂编著《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第284页“禹”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

[10] 对“夸父逐日”的不同理解，龚维英归纳出有八种之多。见龚文《对神话“夸父逐日”的不同理解》，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9期第102页。本书采用王红旗“反映了与炎热和干旱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之说。